

导 言

为民间宗教作志，这是第一次。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民间宗教大都遭到当局的取缔和镇压，被目为“异端”、“邪教”、“匪类”。无论官方文书、正史，抑或文人笔记、杂录，充满了对民间宗教的污蔑、诋毁之辞。在专制统治的时代，是谈不上信仰自由的。

所谓民间宗教，是指流行于社会中下层、未经当局认可的多种宗教的统称。由于这类宗教大都秘密流传，因此有的研究者则称之为秘密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或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我认为，并非任何此类宗教在任何时代都遭受取缔，某些教派传教曾有相当的公开性，如元代初、中叶的白莲教，明中叶的无为教、三一教等等。故不能以秘密宗教加以概括。民间宗教这一概念，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因此本志以民间宗教志为题，为之立志。

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是底层社会，是下层民众，他们虽然数千年被压在金字塔的下层，终生贫困，而且得不到文化的布施。但是只要你真正承认他们也是人，同帝王将相一样都是万类之灵的人类，你就不难发现，他们也有所思所欲，所喜所惧，所依所持，也有自己的幻想和理想，此岸与彼岸，有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与信仰。由此可知，中华文化不只是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还有充满生机、活力的炽烈的一面。民间宗教基本属于这一面。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定的位置，

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它对中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对中世纪的宗教生活、政治生活发挥过重大影响，表现出惊心动魄的力量。

不仅如此，民间宗教像一些民众文化一样，是一切高雅文化、正统神学的孕育之母。正如《诗经》中的风、雅、颂是以风为主体的一样。如果没有下层民众的“风”，何来知识分子的“雅”？统治阶层的“颂”？！连《诗经》的四言诗的形式也是下层民众的创造。没有这种创造，《诗经》不但走不上儒家神圣的殿堂，恐怕根本没有问世的可能。

宗教也是如此。今人都知道中国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但对两千年专制体制下艰难生存的民间宗教还了解不多。中国还有形态各异、盘根错节、源远流长的多种民间宗教，历尽劫难而不衰。正是下层民众及其文化、信仰、风习首先孕育了最初形态的民间宗教，而正统宗教又在民间宗教的基础上锻造而成。世界著名的大宗教无不是循此路而产生的。道教的发生发展最具有典型性。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早在战国时代，原始道教便萌发了雏形。当时楚风崇巫术、重淫祀；而中原一带的民间则盛行着神仙方术，两者都是汉末民间道教发端的源头。汉末，有组织体系的道教肇始。无论是蜀之三张的五斗米道，还是北方张角兄弟的太平道教，皆不见容于统治者，因其起于民间，在民间流传，成为底层民众云集响应的信仰中心，不能不遭受取缔镇压。民间道教的出现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挟带着巨大的力量，一经问世，就给当时的社会造成了巨大的震动。它的出现，说明独尊儒术的社会发生了巨大裂痕，需要宗教的意识形态补其罅漏。以后二三百年间，道教经过知识精英的改造与重建，大批门阀士族及各种上层人士的崇信，而逐渐走向上层社会，表现了它融汇百川的包容量和博大胸怀。唐、宋六百年间，道教真正发挥了正统宗教的功能，甚至一度成为官方神学。而道教即使在那时，其流播

主体仍在民间社会。至于道教的异端则又形成了一系列新兴的民间宗教教派。显而易见，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两者并没有隔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就宗教意义而言，两者没有本质区别。它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演进、转化，不仅在教义、组织、仪式、教规、戒律、修持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存在着对抗、改革与创新。一方面反映了信仰领域新旧关系的变动，也反映了世俗世界对宗教本身的影响，反映了社会不同阶层在信仰上的不同意向与追求。就中国正统宗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而言，道教是有其独特地位的，是不可替代的。中国最早形态的民间宗教即民间道教。本志第一章本应为民间道教作志，但商之于汤一介主编，因尚有《中国道教志》专志，故不再重复。特此说明。

佛教与中国民间宗教亦相涉甚深。佛教不同于道教的是：在传入中土前，在印度次大陆及中亚一带已经传播了几个世纪，成为一种成熟了的、为统治阶层信奉的宗教。佛教也经历了从民间佛教走向正统宗教的漫长历程。当悉达多创立佛教的时代，人们并未将其视为独一无二真教。是时有所谓九十六外道之说。佛教仅是此起彼伏、波澜壮阔的宗教思潮的一种。直到此后百余年，它的历史地位才发生根本性转折。佛教对中国民间宗教影响最大的是它的救世思想，特别弥勒救世思想。弥勒救世思想是大乘佛教普渡尘世众生思想的一种，但它更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它传入的时代恰是汉末魏晋。苦难动荡的现实世界为它的传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不能不引起千千万万的芸芸众生强烈信仰，甚至启迪了部分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追求“无有差别”的佛国净土起而抗争。这种信仰后来与道教教义发生融合，形成了宋、元以后三佛应劫救世思想体系。从晋代下迄近代，这种观念在下层社会流行、蔓延，它激起了无数人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次底层世界的民众运动，冲击着封建时代的传统秩序，改变着专制制度下的世道人心，形成了一种喷发涌动的思想巨流。显而易见，正是

下层世界无数众生的实际需要，才产生了佛教大乘教的救世观念，在这种观念成为一种宗教理论以后，又不能不走向下层社会，被无数民间宗教预言家加以改造、创新，使之适合于广大民众的口味。由此可知，世界大宗教的产生与发展，依赖的是下层社会酝酿已久、规模宏大的宗教运动。这个运动的首要特点即其民众性与民间性。当然作为世界性的大宗教，它的教义必须适应整体人类，即各阶层人群的普遍要求，不能仅仅停留在下层社会和民众中间。只有这样，它才能逐渐以自己的实力走向正统地位。

儒学不是宗教。但儒学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除了统治阶级的倡导外，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与宗教融为一体，二是走向民间社会。儒学大规模传播并深入社会，有两个时代。汉代儒学占了统治地位，但那时已非孔子原道。儒学转向经学依靠了宗教的力量。讖纬经学的产生，孔子神化的出现便是明证。但这时儒学与神学的结合尚是浅层次的。两宋新儒学的产生是强大的宗教思潮影响的结果，道教、佛教对儒学内涵深层次的改造，使儒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其次，儒学成为统治思想，是民间社会接纳的结果，其中包括民间宗教广泛的倡导。正是这种倡导使儒、道结合，或儒、道、释结合成为一种占统治地位并覆盖整个社会的思潮。在这一过程中，儒家道德伦理成为整个民族的道德伦理，也成为众多民间宗教教派的道德伦理和教义的核心内容。我们从今天仍然流传于世的一千余种宝卷和劝善书中不难得出这一结论。

民间宗教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现实，又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不能不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重视。

从现代研究意义的角度讲，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是荷兰人 De Groot, J. J. M 的《宗教受难史》著于 1903 年。其后则有日本学者重松俊章的多篇文章。中国学者在三十年代对这一研究范畴也开始留意，但仅限于译介为主，还谈不上系统的研究。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

李世瑜到河北万全县作社会调查 著有《现在华北秘密宗教》。此后由于多种原因，中国学界对它的研究戛然而止。日本学界并未中断此项研究 最有成就者是铃木中正、泽田瑞穗、酒井忠夫、吉冈义丰、浅井纪、野口铁郎、佐藤公彦等。其中《校注破邪详辩》、《增补宝卷的研究》、《千年王国民众运动的研究》、《中国善书的研究》、《明代白莲教史的研究》、《明清时代民间宗教结社的研究》等等是较著名者。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重新获得生机，本着学术无禁区的态度，开始真正对民间宗教的科学研究。

1987年喻松青著《明清白莲教研究》。1989年拙著《清代八卦教》出版。三年以后 由我和韩秉方承担的‘七五’时期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中国民间宗教史》问世。它标志着我国对此学科的研究水平不再落后于其他国家的学者。在这一过程中，尚有林悟殊的《摩尼教及其东渐》、连立昌的《福建秘密社会》、程歙的《晚清乡土意识》、林国平的《林兆恩与三一教》等等相继出版。涉及此项学科的还有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周育民和邵雍合著的《中国帮会史》、路遥与程歙合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等等著述。至于单篇文章的研究 亦不下百十篇，作者不下十余人，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中国民间宗教研究在台湾亦获得瞩目成绩。其中戴玄之的《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社会》、林万传的《先天道研究》、郑志明的《无生老母信仰溯源》、宋光宇的《天道钩沈》、王见川的《从摩尼教到明教》等都有相当的水准。而以研究帮会闻名的庄吉发亦有数篇民间宗教研究文章问世。

近二三十年来，欧美研究界也掀起了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小热潮。加拿大的 Daniel Overmyer, Judith A. Berling 美国的华裔学者 K. C. Liu (刘广京)、Richard Shek (石汉椿)、Susan Naquin, 德国的 Wolfgang Frank (傅吾康)、Hubert Seiwert (苏为德)、荷兰的 B. J. Ter Haar (田海)、俄国的娥·斯·司徒洛娃等等学者 分别对中国的

白莲教、罗祖教、三一教、八卦教、一贯道、真空教、斋教、收元教、黄天教等等作出了精彩的研究。它说明，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已经走向世界。

在今天，一种宗教现象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即所谓新宗教问题。新宗教不仅在亚洲各国大量涌现，其热潮亦袭击欧美。新宗教成千上万的教团的涌现，至少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研究民间宗教不仅是研究宗教现象的焦点，而且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焦点。我不赞同简单地把新宗教归入民间宗教的概念范畴，但两者的相同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民间宗教教派是五花八门的，新宗教更是类型不一。因此对它们的评价既不能用固有理论模式简单的框架，更不能因政策上的偏差而导致不良后果。

《中国民间宗教志》如果能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发挥小小的作用，也就达到了作者作志的目的。

本志作者尚有一个不小的遗憾，因志篇幅所限，对流行于中国两千年的数以百计的民间教派，不能逐一介绍。对此种缺憾，深望读者识之、谅之。

第一章 弥勒大乘教

迥异中国历史传统的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土时，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宗教。它扎根中土后，两千年间从整体上影响了中华民族，深度、广度任何外来文化罕有其匹。

中国的民间宗教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除受到本土原始宗教、道教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外，佛教的影响亦举足轻重。南北朝、隋唐及其后的弥勒大乘教、发端南宋初年的白云宗、白莲教，肇始于明中叶的罗教等等，无不受佛教启迪，或成为佛教世俗化教派，或成为其流衍和异端。

从思想上对民间宗教影响最大的是佛教的救世思想，特别是弥勒救世思想。从西晋，下迄近现代，这种观念在下层社会流行、蔓延，它激起了成千上万芸芸众生的宗教感情，呼唤起一次次底层社会的民众运动。而弥勒大乘教也在南北朝时代随之而出。

第一节 历史沿革

佛教分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两者都传入中土，但终因大乘佛教更具有适应力和吸引力，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伦理，即

儒家整合社会的观点有某些相通之处，随后逐渐成为中土佛教的主流。大乘佛教的净土观念分两种，一种是弥勒净土观念，一种是弥陀净土观念。弥勒净土观念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影响远大于弥陀净土观念。从那一时代，有关弥勒佛造像远盛于弥陀佛造像，即可得出这个结论。日本学者佐藤永智在其《北朝造像铭考》中，列举了云冈、龙门、巩县诸石窟和所知传世金、铜佛像，从而得出结论，北魏等朝代弥勒佛造像 150 具 弥陀造像仅 33 具。

弥勒净土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有强大的吸引力，首先在于它所倡导的救世思想及其宣传的彼岸净土——兜率天的美好密切关联。它与苦难和大乱不止的社会现实恰成鲜明对照，进而启迪了某些不甘现实苦难的民众，为在地上建立“人心均平”、“皆同一意”、“人身无有百八之患”、“谷食丰贱”的“佛国净土”起而抗争。由弥勒上生经、弥勒成佛经、弥勒下生经等又引发出大量“伪经”，成为这些反抗者的思想武器。具体状况将在本章第二节《经典与教义》中详加分析。

由于弥勒信仰的世俗化，弥勒信仰的异端思想终于引导出一系列沙门举旗造反的事件。

早在东晋建武元年（317 年）北平（今河北满城一带）就发生了沙门造反事件：

《晋书》曰 建兴五年 北平人吴祚聚千人 立沙门为天子。

其事不过二十载，后赵建武三年（337 年）又发生佛太子称帝建元事件 定安人侯子光 自称佛太子。他“转相煽惑”聚众数千 又自称“大黄帝 建元龙兴。分封左右丞相 左右大司马 大将军”等号。不

①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45 页。

② 《太平御览》卷八七五。

久，为当局镇压。

北魏、北齐时代，弥勒信仰骤然兴盛，其他佛教势力也膨胀发展。中国北方寺院林立，“僧尼二百许万”，更加严重地破坏了已经凋敝的北方经济，也冲击儒家固有的纲常伦理，同时引起了佛道之争和第一次“法难”。信仰道教的朝廷重臣崔浩与寇谦之等力劝魏主“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帝从之”^②。第一次“法难”并未改变佛教在中土发展过滥的状况，而此后沙门举旗造反称王者，多不胜数，与佛教发展过滥有直接关系：

（天兴五年402年）二月，……沙门张翘自号无上王，与丁零鲜于次保聚党常山之唐。复四月，太守楼伏连讨，斩之。

（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青州民司马顺则自称晋室近属，聚众号齐王。梁邹戍主崔勋之诣州，五月，乙酉，顺则乘虚袭梁邹城。又有沙门自称司马百年，亦聚众号安定王以应之。

公元458年，北魏文成帝下诏指出：“佛法讹替，沙门混杂”应“精加沙汰，严加坐诛”^⑤。此后，沙门造反非但势未稍减，而且愈演愈烈：

北魏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沙门法秀造反。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沙门司马惠自称“圣王”，谋破平原郡，被擒杀。

北魏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沙门刘惠汪反。

北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沙门刘光秀反。

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沙门刘增绍反。

《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

《资治通鉴》卷一二四。

《魏书》卷二《太祖纪》。

《资治通鉴》卷一二六。

⑤ 《宋书》卷九七《夷蛮传》。

北魏一朝，沙门造反事件接踵而至，终于引发了延昌四年（515年）佛教异端弥勒大乘教的暴动。

当时有冀州和尚叫法庆的，善为“妖幻”之术，于是劝说了勃海人李归伯一家人归顺他。李归伯又招率同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难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勃海郡，杀害吏人。^①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②当局派元遥帅马步兵10万攻讨之。击败法庆军，擒斩法庆。

冀州、勃海在今河北冀县、南皮一带，秦汉以来即为宗教兴旺发达之地。汉末张角即古冀州巨鹿人，结众数十万，“以善道教化天下”。北魏法庆以佛教异端在此创弥勒大乘教，所在民众风行景从，地方大户，举族响应，不能说与此地信仰风习无关。故唐长孺说，大乘暴动的口号是“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毫无疑问，所谓“新佛”就是从兜率天宫下降的弥勒。在传世有关弥勒降生的佛经中未见扫魔之说，但《隋众经目录疑伪经》有《弥勒成佛伏魔经》，正与此相应。唐长孺此说确有见地。大乘教是见诸史料的最早一支以佛教名义创成的民间教派。而且打的是弥勒下生救世的旗号。似应有“伪经”作为该教门之经典。

法庆不仅以弥勒下生相号召，而且篡改大乘般若学之原义，以“杀一人者为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为蛊惑。大乘般若以入理般若则为住，十住即佛典所云获得智慧的十个层次，十住又称十地，故十住菩萨又称十地菩萨，为得大智慧者。十住菩萨进而修行则成佛果，因此十住菩萨地位仅次于佛。显而易见，法庆是以弥勒佛自居的，而封李归伯为十住菩萨，地位仅次于法庆。

^① 《魏书·元遥传》。

从官方史料看，法庆的暴动是极为残酷的。认为杀人越多佛果越多，军功越大。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法庆暴动“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是以佛教为攻击对象的。而且认为这种行动是在除魔。北魏时代，佛教发展过滥，已到非加以限制不足以革除弊端的地步。上层统治者由于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社会本身就会造出另外一种力量革除这种弊端。法庆暴动以一种异常激烈、越出常规的行动进行了另外一次“灭法”运动。

法庆弥勒大乘教起事失败后，不过十载，北魏孝明帝正光五年（494年）汾州（今山西临汾一带）等地少数民族冯宜都、贺悦回成等人“以妖妄惑众，假称帝号，服素服，持白伞白幡，率诸逆众，于云台郊抗拒王师。……大破之，于成斩回成，复诱导诸胡，会斩送宜都首。”这次暴动似为弥勒教与摩尼教最初之融合。澳大利亚华裔学者柳存仁先生即认为摩尼教应在南北朝时代即传入中土，且与弥勒信仰相融合。唐代有《禁断妖讹等敕》可证：

比有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

此处“白衣长发”之人既非沙门，又不合汉俗，应是西来的少数民族，或受“胡人”影响的汉人。

弥勒大乘教，在隋代又有发展。隋大业六年（611年）有盗数十人，皆素冠练衣，焚香持花，自称弥勒佛。入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既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

隋大业九年，陕西扶风人，沙门向海明，自称弥勒佛出世，潜谋逆乱。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人皆惑之，三辅之士，翕然称为大圣。

《魏书·裴良传》。

《册府元龟》卷一五九《帝王部·革弊》。

《隋书》卷三《炀帝纪》。

因举兵反，众至数万。官军击破之”。^①

同年，有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天夜里，楼上有光明，变成佛像。他“自称弥勒出世。……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遂擒斩，并坐其党与千余家。”^②

隋大业间，炀帝造孽无穷，天下大乱，民心摇恐，由是以称弥勒下生救世的反抗事件不绝于史书。弥勒教或弥勒大乘教大兴于世，正是动乱时代民心的一种反映。

唐代数百年间，亦有数次弥勒大乘教的活动。武德元年“沙门高昙晟，……自称大乘皇帝”^③，改元法轮，后高氏被杀。^③

唐代较著名的一次以弥勒下生相号召的事件，发生在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当时贝州人王怀古对人说：“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灭，刘家欲兴。今冬当有黑雪下贝州，合出银城。”^④这种说法带有宿命论观点，但实质上已经演化成一种政权更迭的政治内容，不能不引起唐玄宗的注意，于是年十一月下诏书：

释氏汲引，本归正法，仁王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诡怪，岂涅槃之信士。不存惩革，遂废津梁，养彼愚蒙，将入坑井。比者白衣长发，假托弥勒下生，因为妖讹，广集徒侣，称解禅观，妄说灾祥，别作小经，诈云佛说，或诈云弟子，号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闾阎，触类实繁，蠹政为甚。刺史县令，职在亲人，拙于抚驭，是容奸宄。自今以后，宜严加捉搦。

这个诏令，指出了唐代弥勒大乘教的几个特点，有经书，有修持，

^① 《隋书》卷二三《五行》下。

《资治通鉴》卷一八六。

《册府元龟》卷九二二。

《册府元龟》卷一五九。

有戒律，而服饰打扮亦异于常人。对当政者来说，弥勒大乘教已成为“蠹政为甚”的心腹之患。

但这类诏令再严厉，也无济于事，因为它无法改变一些下层民众的基本信仰。故直至唐王朝行将就木，而弥勒信仰仍广泛地在民间流传，并成立弥勒会等组织，以对抗当局。唐广明元年（880年）“青城山妖人作弥勒会”，冒充达官贵人“陈仆射行李，云山东盗起，车驾必幸蜀”。后为当局侦破，全数被抓获。

有唐一朝，弥勒大乘教活动与之相始终。唐灭后，弥勒大乘教依然在民间潜行默运，且愈演愈烈。时至北宋，同样在贝州，发生了与唐代王怀古相类似的王则造反事件。宋代庆历七年（1047年），在贝州当兵的王则率众占领了贝州。史料记载：“则，涿州人，初以岁饥，流至贝州，自卖为人牧羊，后隶宣毅军小校。贝、冀俗尚妖幻，相与习为《五龙》、《滴泪》等经及诸图讖书，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则与母诀也，尝刺福字于背以为记。妖人因妄传则字隐起，争信事之。州吏张峦卜吉主其谋，党与连德、齐诸州，约以明年正旦，断澶州浮梁，作乱。……则僭称东平王，国曰安阳，年号曰德胜。旗帜号令皆以佛为号。”^②王则暴动后，宋王朝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击败王则军，擒拿王则，斩于京师。

三百年前，王怀古在贝州倡言“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提出合出“银城”。三百年后，还是在贝州，王则倡言“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提出建立“安阳”国。所谓银城，又叫云城，是唐代以后部分民间宗教追求的天堂。王则建国安阳，是“安养”的讹音，安养即安养极乐国，即佛教的安养净土。无论王怀古还是王则都希望在人间建立佛国净土世界，即平等世界。故王则又自称“东

《太平广记》卷二八九《妖妄》。

《宋史纪事本末》卷三二《贝州卒乱》。

平王”。

在宋代尚有弥勒教与摩尼教混合的教派，名叫“香会”或“集经社”的。关于集经社和香会最早的记载是《宋会要辑稿》。时为大观二年(1108年)：

契勘夜聚晓散，传习妖教及集经社、香会之人，若与男女杂处，自合依条断遣外，若偶有妇女杂处者，即未有专法，乞委监司每季一行州县觉察禁止，仍下有司立法施行。

香会之名再现于史料，已是元代初年：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全真、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邪也。

“香会”在元代末年演化成香军，即红巾军。元末元顺帝至正十一年“颖上、颖川红军起，号为香军，盖以烧香礼弥勒得名也。其始出赵州滦城县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③ 据我在《白莲教辩证》一文考证，香会为弥勒教与摩尼教相混合之教派，故其教提出“明王出世，弥勒下生”^④ 的口号。详见本书摩尼教一章。

弥勒下生救世观念，在明清两朝的底层社会和民间教派中日渐形成体系，成为涌动在民众中的思想巨流。在黄天教、闻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等大教派中，成为一种天道观和救世观。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八。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马西沙：《白莲教辩证》载《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4期，第1—13页。

第二节 经典与教义

弥勒观念于汉末传入中土，西域僧人安世高译《大乘方等要慧经》，介绍了有关弥勒信仰之内容。其后西晋西域僧人竺法护译《弥勒下生经》，弥勒净土思想得到较完整的介绍。从此，有关弥勒净土经典相继译出。而“伪经”亦大量产生。在隋唐以后形成了燃灯、释迦、弥勒三佛应劫救世观念，并在民间广泛流行。明清时代，无生老母观念日趋成熟，形成无生老母派遣“三佛”应劫救世观念。

一、经典

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述，从汉末至南北朝末，那一时代有关弥勒信仰有如下译经：

- 《大乘方等要慧经》后汉安世高译（现存）
- 《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西晋竺法护译（现存）
- 《弥勒成佛经》法护译
- 《佛说弥勒下生经》法护译（现存）
- 《弥勒当来生经》西晋失译
- 《弥勒来时经》东晋失译
- 《弥勒所问本愿经》东晋祇多蜜译（现存）
- 《弥勒大成佛经》后秦鸠摩罗什译（现存）
- 《弥勒下生成佛经》鸠摩罗什译（现存）
- 《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凉沮渠京声译（现存）
- 《弥勒成佛经》后秦道标译

《弥勒下生经》陈真缔译

《弥勒菩萨所问经》留支译（现存《弥勒所问经释论》）

以上所录诸经尚未全括西晋下迄隋唐社会流行有关弥勒净土经典。同仁杨曾文在其作中指陈：《出三藏记集》（佑录）等书中记载失译经录 其中包括部分“伪经”：

《弥勒经》一卷 道安云出《长阿含》）

《弥勒当来生经》（《开元录》附西晋录）

《弥勒下生经》一卷（《开元录》卷一四谓陈真缔译）

《弥勒菩萨本愿待时经》（抄本）

《弥勒为女身经》一卷

《弥勒受诀经》（《祐录》云未见经文）

《弥勒作佛时经》一卷（同上）

《弥勒难经》一卷（同上）

《弥勒须河经》一卷（同上）

卷五所载伪经目录中有：

《弥勒下教经》一卷

隋法经《众经目录》卷二所载伪经中还有：

《弥勒成佛本起经》十七卷

《弥勒下生观世音施珠宝经》一卷

《弥勒成佛伏魔经》一卷

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十八所载伪经：

《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

《金阴密要议经》一卷（注兼说弥勒下生事）

《弥勒下生遣观世音大势至劝化众生舍恶作善寿乐经》一卷

《随身本官弥勒成佛经》一卷

《弥勒摩尼佛说开悟佛性经》一卷

此外从唐宋至清代，民间尚流行大量关于弥勒净土信仰的经书、宝卷，特择录于下：

《龙华誓愿文》(唐宋时代)

《弥勒三会记》(唐宋时代)

《龙华会记》(唐宋时代)

《五龙经》(北宋)

《滴泪经》(北宋)

《弥勒颂》(明成化)

《弥勒佛说地藏十王宝卷》(明)

《三教应劫总观统书》(清初)

《大圣弥勒化度宝卷》(清)

《弥勒佛出西宝卷》(清)

《布袋经》(清)

《弥勒古佛救劫篇》(清)

《弥勒尊经》(清)

二、教义——弥勒救世思想

关于弥勒(Maitreya)的由来，《弥勒上生经》、《弥勒下生经》都有说明。弥勒是波罗捺国劫婆利村人，出身于上层大婆罗门家族。弥勒以慈氏为名，阿逸多为姓，或称弥帝隶，梅低丽，迷缔隶，最流行的称谓是弥勒。

杨曾文：《弥勒信仰的传入及其在民间的流传》，载 1985 年《中原文物》特刊。

参见马西沙、韩秉方《中国民间宗教史》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68—69 页。